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4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 修订译本 ·

[法]米歇尔·福柯 著 莫伟民 译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4

词与物

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 修订译本 ·

[法]米歇尔·福柯 著 莫伟民 译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修订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7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5652-0

I. ①词… II. ①米… ②莫… III. ①哲学理论—法国—现代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6352 号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

著 者 / [法]米歇尔·福柯

译 者 / 莫伟民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28.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52-0/B · 487

定 价 / 6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总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本书翻译修订得到巴黎高师“文化变迁与传播重点研究所”(Labex TransferS)的资助,也是译者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世纪法国哲学研究”(14AZX012)的阶段性成果。

译者的话：19世纪——“人”的世纪

《词与物》是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最重要的成名作、代表作，至今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对世界学术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勒兹之所以把福柯这部扛鼎之作誉为“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作品”，这不仅是因为《词与物》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初的整个西方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而且更是因为它从根本上驱除了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迷雾，批判了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意识哲学和主体性形而上学。我们知道，无论是马克思的人类学解释，还是尼采的语文学解释，都拒绝依据先验意识来进行解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德勒兹的欲望谱系学也都意识到了先验哲学的终结。

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鉴于《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主要梳理的是关于“分裂”、“差异”的历史，《词与物》则致力于“秩序”之历史，相似性之历史，相同之历史，同一性之历史，要探讨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之间差异借以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理性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秩序”、“相同”、“同一性”成了《词与物》的几个关键词。《词与物》要重构西方16—19世纪在语法和语文学、自然史(或博物学)和生物学、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实证知识得以在其中确立的秩序空间，并为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经验的哲学反思和合理性的塑成和消失提供历史先天性基础。该书英文版的书名《物之序》，就说明了该书的理论焦点。而这里所说的“相同”、“同一性”主要是指通过对物进行

整理,让物具有秩序,从而让不同者趋同,让相异者归于相同者名下。这种处理“词”与“物”之间关系的方法就是近代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典型做法,也是福柯在书中所要着力批判的人类学主体主义。

虽然该书的书名是“词与物”,但福柯在书中,既没有专门分析“词”,也没有具体分析“物”,而是聚焦于话语实践了。因为不同于传统哲学所关注的“词”如何通过“主体”来勾画“物”这一古老问题,福柯的问题就是:通过分析那些介于词与物之间的话语实践(pratiques discursives),来确定何谓物并测定词如何使用。福柯想表明在像自然史这样的话语中,存在着对象形成的规则(并非词的使用规则),概念形成的规则(而非句法规律),理论形成的规则(而非演绎或修辞的规则)。正是这些由话语实践在特定瞬间运转起来的规则才说明了某个物被看到或疏忽了;它从这样一个方面被设想并且在这样的层面上被分析;这样的词与这样的意义一起被使用并在这样的句子类型中。因此,相比于话语实践的分析,基于物的分析和基于词的分析似乎都是次要的(Michel 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explique son dernier livre”, 1969,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776)。

人文科学考古学

《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也提请我们注意,福柯所做的工作并不像梳理观念史或科学史那样来梳理人文科学史,而是从事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要阐明那个已撇开了任何理性价值或客观进步的认识论领域,即知识型(l'épistémè),并强调应该把知识空间内那些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经验认识的构型揭示出来。于是,“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历史,还不如说是一种‘考古学’”(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6, p. 13)。但福柯特地指出,他所讲的“考古学”并不确切地指一门学科,而是指一个针对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研究领域,福柯要探寻该领域内作为认识、理论、制度和

实践之深层的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如正是有关癫狂与非癫狂相对立、有序与无序相对立的某种知识才使大禁闭中心在17世纪末的欧洲有可能开设。在社会中，不仅认识、哲学观念和日常舆论，而且制度、商业和治安实践、生活习惯，这一切全都诉诸这个社会特有的某种暗含的知识，这种知识截然不同于我们能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赦罪中发现的知识。福柯在从事“人文科学考古学”之后再进行“知识考古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福柯很清楚这种考古学的功效：由于这种研究聚焦于处于相同层面之上的实践、制度和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并探寻使这三者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探寻构成性的和历史性的知识层，因而有可能使福柯避免理论先于实践或实践先于理论的棘手问题。福柯不像萨特那样从实践惰性的角度来说明这个共同知识，而是设法对这种知识作出一种有关理论活性的分析。

如果说《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始终关注的是话语层面与实践、制度、社会和政治关系等其他层面之间的相关性，那么，《词与物》则想到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进一步发现“话语领域并不始终服从话语与实践和制度领域所共有的结构，相反，话语领域服从话语与其他认识论领域所共有的结构，在一个特定时期，存在着话语相互之间的同构性”。因此，我们面前有两个垂直的描述轴心：几个话语领域所共有的理论模式的轴心，话语领域与非话语领域之间关系的轴心。在《词与物》中，我描绘了水平轴心，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我则讨论了垂直的维度”(Michel Foucault, “Sur la façons d'écrire l'histoire”, 1967, *Dits et écrits*, I, 1954 –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590)。

福柯既不想撰写人文科学的一般历史，也不想对科学的可能性作一般的批判。“《词与物》的副标题不是人文科学唯一的考古学(l'archéologie)，而是人文科学的一种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Michel Foucault, “Questions à Michel Foucault sur la géographie”, 1976,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29)。对此，我们可作两点理解。首先，这不仅敞开了学

者特有的谦逊的胸怀,即他“不是那类对或想对无论什么样的科学都拥有真理话语的哲学家”,而且还亮明了福柯一贯的拒斥立场,即他完全否认有什么科学的科学能在整个科学中发号施令,起着普遍裁决、判决和见证这样的作用。其次,这表明福柯在《词与物》中只涉及了“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探究了生命科学、经济科学和语言科学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初发生了认识论断裂,然而,福柯还假定有另一种考古学,要对自16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知识和政治意识进行专门分析,要研究历史和政治理论如何以及为何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而马克思思想在这两种考古学中所处的地位明显不同。在前一个考古学中,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仍处在由李嘉图开创的认识论空间内,马克思并未带来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在后一个考古学中,福柯假定马克思在有关人的历史和政治意识中引入了一个彻底的决裂,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领域。也正是在此,福柯展现了自己与导师阿尔都塞之间明显的理论分歧。

福柯不仅诊断我们所生活的目前,批判线性历史观、因果观,还诊断和批判人本主义。福柯在两个方向上展开“考古学”:“知识”的对象如何构建,一个对象如何能够成为“知识”的对象;某类科学话语如何起作用。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也相应设法分析:“人”这个新对象如何以及为何出现在17世纪直至整个18世纪的科学话语中,人文科学又是如何以及为何能随着人的出现而有可能被构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哲学论题,即人如何以及为何既是可能科学(人的科学)的一个对象,又是任何认识据以可能的存在,是任何种类认识的源泉。

这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已经揭示了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在西方文化知识型中的两个巨大的断裂。西方理性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第一次断裂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结和古典时代的开启,标志着能构建知识的相似性原则被同一与差异原则所取代,标志着阐释被分析所取代,标志着词与物从同一走向分裂,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了。第二个断裂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

终结和现时代的开端，在现时代表象理论、语言都消失了，同一与差异被有机结构所取代；人(l'homme)只作为物之序中的一条裂缝而首次进入西方知识领域，人类学产生了，并且适合于人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也打开了。

因福柯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热衷于那些与哲学相近的、能在发展过程中连续不断地涌现出真理和纯理性的崇高的、严密的和具必然性的科学(如数学、宇宙学和物理学)，所以，《词与物》对“知识的匿名的间断性”的考察，完全是聚焦于那些因涉及到生物、语言或经济事实而被人认为是具有偶然性的经验对象的科学。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从自然史(或博物学)到生物学，无不都是经验科学。《词与物》的初始假说就是，经验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也可以是有明确的规则的，谬误与真理都可以遵循某个知识译码的种种法则，非形式化的知识的历史本身也拥有一个系统。当然，《词与物》并不是想在特殊类型的知识或观念体系的基础上重构大时段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观，而只是一种严格的“区域性的”研究，描述特定时期特有的认识论空间(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à l'édition anglaise”, 1970,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 7–8)。

对博尔赫斯所引述的某部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的读解，是促使福柯撰写《词与物》的主要动因，从而使福柯认识到确立物之序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从事差异思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福柯曾说过，他“在《词与物》中想从事的是秩序的历史，说的是一个社会借以思考事物间的相似性的方式和事物间的差异借以能被把握、在网络中被组织并依据合理图式而被描绘的方式”(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498)。因而，《词与物》考察有关词(语言)与物(实在)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分析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撰写“知识型”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基本上是间断的历史。

福柯要用差异分析来取代像“理性进步”或“世纪精神”这样的

总体化历史的论题。这种差异分析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时期的知识总和，其探究的一般风格，而是其多重科学话语的间隔、距离、对立、差异、关系，是作为一个时期的知识型。福柯所说的知识型不是“一种隐藏的重大理论”，而是一个散布空间，是“诸关系之一个开放的并且可能是不确定地可描述的领域”(Michel Foucault, “Réponse à une question”, 1968, *Dits et écrits*, I, 1954 –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676)。知识型不是“理性的一个普遍阶段”；知识型是前后相续的差距的一种复杂关系(ibid., pp. 676 – 677)。福柯并不设法从各种符号出发去探测一个时代的统一精神、一个时期的意识之普遍形式，像世界观这样的某物，也不再描述一个一度支配着思想的所有表达的形式结构的隐现：福柯也不撰写一种先验切分节拍的历史，也不描述数百年的思想或感受性，这些思想或感受性诞生、结巴、斗争、熄灭，就像那些重大鬼魂在历史的后台上演其阴影戏剧。

知识型并不是所有学科所共有的一个历史分支，而是“特殊剩留的一个同时性游戏”(ibid., p. 676)。《词与物》中使用的“知识型”，指的是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科学之间或各种部门科学中的不同话语之间的这些关系现象，就构成了福柯所说的一个时期的知识型。因此，福柯的知识型与康德的范畴毫不相干(Michel Foucault, “Les problèmes de la culture, un débat Foucault-Preti”, 1972, *Dits et écrits*, II, 1970 – 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371)。作为不同科学之间的关系集合，知识型就是西方文化特定时期的思想框架，是“词”与“物”借以被组织起来并能决定“词”如何存在和“物”为何物的知识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无意识的思想范型。

由于从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对语法或财富体系作研究时，只需通过能对物之序作表象的话语，而无需通过人文科学，所以，人在古典知识内部并不存在。只有从 19 世纪初起，当话语失去了它在古典知识中曾经拥有的组织作用和对经验世界的法则力量时，人才存在，人文科学才产生。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与话语的存

在是不相容的，人之序与符号之序是不相容的，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只存在于话语消失的地方。因为在19世纪，以人为经验对象的人文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是在“知识三面体”（一是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演绎科学，二是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这样的经验科学，三是哲学）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现代思想不能使这三者各居其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所以，就容易使这三者陷入人文科学，进而陷入“人类学主义”的危险之中。由于这三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人文科学的疆域和对象也是易变的，人文科学势必被精神分析和人种学这样的反人文科学所取代。精神分析和人种学都不停地“拆解”那个在人文科学中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实证性的人，它们并不询问人本身，而是询问通常使得一种有关人的知识成为可能的区域。福柯借用列维-斯特劳斯就人种学所说的话来说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即它们消解了人（elles dissolvent l'homme）。人从不存在到存在再到消失，这都是西方知识型的知识的基本布局发生变化的结果。在福柯看来，从16至18世纪，尤其在古典时代，由于西方文化受制于“神、事物间的相似、空间法则”，受制于“肉体、激情和想象”，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大写的话语存在着，所以，人就不存在，也就谈不上人的有限与无限了，也就不可能有人类学的立足之地。人只是始于19世纪的现时代的“特产”，因为现时代的人类学和意识哲学把人类存在建构为可能的知识对象，奢谈作为自由和存在主体的人，梦想着在有限的、具体的人上面构建无限的、抽象的知识。而精神分析、人种学却使这样的梦想破灭了。

为了确切地构建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知识，福柯要在不同维度上去确定17世纪以来，尤其在19世纪的科学话语的存在方式（它们的形成规则、条件、从属、转化）。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设法限定传统思想史之无边无际的空间，从而设法把话语领域从19世纪哲学强加于它的历史—先验结构中解放出来。福柯通过由不同“话语”（discourants）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实施操作，不仅质疑了至高无上的主体的论题，该论题从外部激活语言学编码的惰性，并

在话语中置放其自由之难以抹去的痕迹；还质疑了主体性的论题，该论题在话语中构建意指并记录下这些意指。因为福柯的话语领域显得是一组有规则的实践，这些实践并不简单地在于赋予思想的敏捷内在性一个可见的和外部的形体，也不向事物的坚固性提供使事物倍增的显现的表面。福柯充分感受到人文科学考古学已让意识哲学家们寝食难安、烦躁不已、深感不适：有点刺耳的是，福柯不从悦耳的、沉默的和内在的意识出发，而是从一组灰暗的匿名规则出发来对待话语。令人不快的是，福柯揭示出一种实践的界限和必然性，而人们通常习惯于在纯粹的透明性看到天才和自由的游戏展现出来。具有挑衅性的是，福柯把这种话语史视为一组转化，这种话语史直至此时都是由生命的令人放心的形变或生活体验的意向连续性所激发的。难以容忍的是，福柯勾勒、分析、组合、重组所有这些现在被归于沉默的文本，而不描绘出作者的面目一新(Michel Foucault, “Réponse à une question”, *Dits et écrits*, I, 1954 –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694)。福柯以一句反问“谁讲话，这有何重要呢？”，就把传统哲学的主体轻松打发了。

人文科学考古学与知识考古学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值得关注。福柯不愿看到《词与物》因使用了“知识型”、“语言”这样的词而被人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作品，不愿看到因自己的人文科学考古学使用了“知识型”而被别人看作是依据文化总体性作出的。因而，在三年后的《知识考古学》的“前言”中，福柯承认包括《词与物》在内的先前的著作并没有很完善地挣脱最后的人类学束缚，作为对先前三部著作的方法论总结和概括，《知识考古学》并不是对《词与物》的复述或确切的描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词与物》的，它“还包括不少的纠正和内部批评”。纠正工作的重要方面就是转换术语，如用“话语”来替代“语言”，用“话语实践”来取代符号的指称作用，用“话语”的重要性来取代“知识型”的重要性。“话语”是不能还原为语言或言语的，“历史的先天知识”要说明的是，“话语并不只具有意义或真理，而且还具有历史，有一种并不把它归于奇

异的生成变化律这样的特殊的历史”(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9, p. 168)。“我们可把一组属于同一个话语构成的陈述集合称作话语……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有限陈述的一组存在条件……话语通体都是历史的……”(ibid., p. 153)这样的陈述体系就构成了“档案”，“档案对处于各种各样存在之中的话语作区分，并详细说明话语特有的延续”(ibid., p. 171)。很显然，“话语”直接就是由构成为“档案”的陈述构成的，因而历史先天性和档案并不是知识型的具体化，而知识型也不是话语的具体化。我们既不能认为具有特殊历史的“话语”要比“知识型”更抽象，也不能以为作为无意识的知识总体的“知识型”是“通体皆历史的”话语的具体化，不能认为“档案”和“知识型”都是“话语”的产物。虽然《词与物》也使用“话语”，但此“话语”非彼“话语”，它指的是起着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在西方知识史上是与人水火不相容的和交替出现的。福柯恰恰要批判西方哲学史传统的“基础主体的论题”、“对立的论题”、“初始经验的论题”和“普遍中介的论题”都忽视了话语的“实在性”：“话语实在性在哲学思想中被忽视这一非常古老的做法，在历史进程中已呈现出许多形式”(Michel Foucault, *L'ordre du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1, p. 48)。于是，福柯知识考古学要质疑西方的真理意志，恢复话语具有的事件的特性，最终消除能指的统治权。此外，我们从福柯对于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可得知，历史先天性和档案并非知识型的具体化。从福柯后来提出“权力—知识”这个合二为一的概念来看，福柯也并未把权力看成是知识型的体现，因为“自《监视与惩罚》以来，知识型已被权力所取代(Carlo Freccero, “Savoir et pouvoir à l'ère de la vidéo”, *Magazine littéraire*, N°325 – octobre 1994, p. 32)”。显然，福柯在不同时期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有其特定的文本意义和语境价值。在《词与物》的“知识型”、《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和《监视与惩罚》的“权力”这三者之间比较哪个概念最重要，并无多大学术价值。“人文科学考古学”与“知识考古学”之间的异同、传承关系还是不难弄清楚的。

人死了？

康德的三大批判和四大问题在促使西方思想无视其现代性时，不仅引导了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崇尚古希腊哲学而去思考人类与存在的关系，还引导了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依据康德批判哲学而去质疑人类知识的形式和界限。肇始于尼采“怪异”思想的现代哲学仍然徘徊在这两条路径上而不得抽身。福柯的历史存在论尝试通过探求基于思想与话语的统一性之上的“主体真相”来走出这个理论困境。作为人文科学之客体和主体的“人”被反人文科学消解了。“人之死”成了福柯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宣言。

尼采、萨德以说“人的坏话”而出名，而福柯秉承这一传统，并基于对人的科学的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考古学探究，而呼吁人们摆脱贫得自19世纪的沉重遗产——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设法用道德、价值、调和的术语去解决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福柯批评的矛头直指萨特、加缪的“萎靡不振的人道主义”：“在1948年，恰恰就是人道主义被用来证明斯大林主义和基督教民主的霸权，我们在加缪或萨特存在主义那里重新发现的正是这同一个人道主义。最终，这个人道主义已以某种方式构成了最近20年所有思想、所有文化、所有道德、所有政治的小娼妓。我考虑到我们今天想把这个人道主义推举为德性楷模，这就是挑衅”(Michel Foucault, “Qui êtes-vous, professeur Foucault?”, 1967, *Dits et écrits*, I, 1954 –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 616)。福柯认为人文科学并不导向“人”以及人的真理、本性、诞生、命运；实际上各门人文科学所关注的对象绝非人，而是系统、结构、组合、形式等。因而，如果我们想严肃地关注人文科学，首先就必须摧毁由“必须寻找人”这个观念构建的那些神志不清的幻想。《词与物》断定人的历史并不古老，尚不足两个世纪。而人文科学也是在19世纪发明的。当人们在19世纪把人构建为知识对象时，就发明了人文科学。但人们在使人成为认识的对象时，是为了让人由此摆脱其异

化，摆脱所有自己所不能控制的确定性，从而使人能成为他自己的自由和他自己的存在的主体。福柯把这样的想法视为19世纪一个重大的末世学神话。

可神话毕竟不是现实。虽然人似乎诞生于19世纪，但福柯却发现，就人们展开了这些针对作为可能的知识对象的人的调查而言，人们从未发现这个著名的人，这个人性，或人的本质，或这个人的特性。例如，当人们分析癫狂或神经官能症的现象时，人们发现的是渗透进冲动和本能的无意识，是依据力学和拓扑学空间而起作用的无意识（严格讲来，凭着人们能从人的本质、自由或人类存在指望到的东西，可在这个空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是如人们近来所说的起着语言般作用的无意识。因此，就人们从根本上对人进行围捕而言，人消失了。人们走得愈远，就愈看不见人。对语言也是如此。自19世纪初以来，人们已询问了人类语言，以便设法重新发现人类精神的几个重大的常数。人们期望，在研究词的生命、语法的发展时，在对语言做相互比较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来的正是人本身，或人的面目是统一的，或人有不同的侧面。然而，在钻研语言时，我们能发现什么呢？我们已发现了结构。我们已发现了相互关系，已发现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准逻辑的体系，而具有自由和存在的人仍在那里消失了。但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人文科学也将随之消失，而是指人文科学将不再在一个由人道主义限定的领域内展开。在哲学中可能要消失的人，不是作为知识对象的人，而是作为自由和存在主体的人。然而，人类主体，拥有其意识和自由的人类主体，根本上是一种与神相关的形象，一种人的神学化（théologisation），神重新降临到世上，它意味着19世纪的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学化了。（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répond à Sartre”,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 663–665）。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经验证明了这个人道主义论题如何既不富有任何成果，而且是有害的、有毒的，因为它使得最不同的和最危险的政治操作成为可能；实际上，向从事政治的